

上海都市型乡村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 挑战及其实现路径

卢文秀¹ 吴方卫

(上海财经大学 200433)

【摘要】:上海都市农业发展要“扬长避短”,充分利用大都市的资金、物资和科技优势增加农业投入,提高农业用地产出效益。一是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蔬果、花卉等,采用技术手段拉长农产品上市供应期,尽可能实现全年生产、四季供应,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和产值。二是培育一批数字技术应用示范基地,推进5G智慧大棚、无人机植保、农业机器人、智能环控设备等农业新技术应用先行先试,利用消费者偏好数据分析指导精准种植,带动数字农业由点到面不断推进。

【关键词】:都市型乡村产业 产业融合 数字农业

【中图分类号】:F30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22)11-0076-008

近年来,上海农业产值占全市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经下降至不足1%,郊区乡村空间正在由不断收缩向基本稳定转变,乡村资源的稀缺性日益凸显。“十三五”时期,上海积极构建与大城市相适应的乡村产业体系,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都市休闲农业快速发展,现代都市农业竞争力综合指数居全国首位。^①乡村产业发展呈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态势:在生产功能方面,粮食和“菜篮子”生产能力保持稳定,农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在生活功能方面,以37个乡村振兴示范村、17个乡村旅游重点村等为载体,培育多个康养、教育、文旅等生活型服务业;在生态功能方面,农业绿色发展全面推进。

在耕地、劳动力资源不断缩减的背景下,上海农业生产功能的基础性地位依然得到保障,得益于较高的农业先进生产要素集聚水平。一方面农业设施装备水平显著提升,2020年底,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达到95%以上,设施菜田绿叶菜生产机械化水平达到60%,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79.09%(全国59.2%)。另一方面是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取得新进展。2020年,上海完成了9个涉农区粮田、菜田等六大类农业生产用地上图工作,形成了上海农业生产用地一张底图,与农产品安全网格监管、涉农补贴等其他系统数据完成对接。

与此同时,上海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绿色农业发展模式正在形成。2020年底,上海主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6.5%,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率达98%。化肥施用量(折纯量)从2000年的24.67公斤/亩下降到2020年的18公斤/亩;农药施用量从2000年1.33公斤/亩下降至2021年的0.67

¹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劳动禀赋时空异质性变化下我国种植业结构调整问题研究”(71873082)。

作者简介:卢文秀,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吴方卫,上海财经大学城乡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²①上海财经大学三农研究院:《中国现代都市农业竞争力综合指数(2017)》。

公斤/亩。

另外,农业产业化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在推进农业提质增效、联农带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形式主要包括:龙头企业带动型、专业市场带动型以及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带动型3类,其中龙头企业销售收入占比较大,约1314.65亿元,且呈逐年上升态势,专业市场交易总额为1041.47亿元,农民专业合作社收入为79.59亿元。产业化组织利润总额从2006年的20.99亿元增加至2020年的64.63亿元。^③

作为超大型城市,上海都市型乡村产业定位正从承担农产品生产保障功能向承担多元复合功能转变,由发挥就业缓冲作用向拉动经济内循环转变。作为全国都市农业的典型代表,理应在新形势下探索创新都市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为国内都市农业发展提供示范样本。因此,本文通过梳理总结当前上海典型的乡村产业融合模式,尝试找出上海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推动上海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路径选择,为全国其他地区都市农业发展提供典型经验。

一、上海都市型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典型模式

近年来,上海积极推进乡村产业从生产型向服务型延伸,在着力优化一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探索形成了多种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乡村产业融合水平逐年提高。2011—2020年,上海第一产业产值占全年生产总值(GDP)比重下降57.14%,人均农副产品加工业产值增长58.95%,人均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上升195.65%,农业机械化程度增长近一倍。总体来说,上海的农业与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效果较好,且农业技术渗透愈来愈深入。根据测算,^④上海乡村产业融合水平从2011年的0.084增长到2020年的0.118,增长了40.48%,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乡村产业融合子系统发展差异较大、均衡性不足。农业服务业融合、农业新业态培育以及利益联结机制发展水平明显较低,对乡村产业融合综合水平的贡献度不高。这表明上海农业与旅游、技术服务业的融合度还不够深入,乡村产业联农带农的机制还不完善,有待进一步提升。为了更深入全面地把握上海乡村产业融合现状,本文在融合度测算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总结上海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典型模式,以期对上海持续推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其他地区发展乡村产业提供经验借鉴。

(一)农业为基,科技引领的“1+2”智能化、工厂化农业模式

该模式一般以农业产业园为载体,引进农产品加工企业,以企业或者合作社为核心建成集标准生产、精深加工、冷链配送为一体的农产品全产业链体系。其主要特点是:高效集约,大量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使得作物生长环境基本摆脱对自然的依赖。

以上海金山区现代农业产业园为例,主要做法有:一是科技引领,打破农业“靠天吃饭”思维。上海联中食用菌专业合作社通过引进荷兰双孢蘑菇智能化控制设备和技术实现蘑菇种植工厂化转型。传统草棚种植模式一年一茬,产量约6000公斤/亩。采用工厂化种植后,技术从二次发酵提升到三次发酵,每年可种植11茬左右,产量可达26万公斤/亩。数据显示,目前上海市双孢蘑菇日销量的12.5%来自上海联中食用菌专业合作社。二是创新营销模式。金山区廊下镇建立叮咚买菜蔬菜实验基地,基地占地面积200亩。与传统销售模式不同,试验基地的蔬菜直供叮咚买菜电商平台。蔬菜采摘后首先被运往分拣中心分拣、包装,再通过冷链物流运送至叮咚买菜的前置仓,以便随时供应社区居民。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进入小区

^③①数据来源:上海调查年鉴。

^④②本文通过投入产出表分析和乡村产业融合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两种方法,测算出“十二五”“十三五”时期上海市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

域规模的配送模式既保证了生鲜产品质量可追溯，又提高了用户体验感。

(二) 农业主导，服务业渗透的“1+3+2”农文旅模式

该模式一般是以特色农业为基础，通过乡村旅游业驱动农业发展，侧重强调主导农业有特色、生态环境友好、农村集体经济和村民共同参与。以崇明区三星镇为例，镇级层面建立三星镇田园综合体管委会，村级层面在村集体资产确权的基础上，与玉海棠公司按照1:4的持股比例合资，玉海棠公司负责产业招商、项目建设和运营维护。主要做法：一是基于“一花一草一湖”特色农业，延伸产业链条。“一花”指海棠花，新安村种植各类海棠苗木1.143万支，盆景2.8万盆，打造了23亩海棠盆景园。基于大规模的海棠种植，带动海棠观赏、艺术栽培和科普教育等业态发展。“一草”指苦草，因其具有排恶露、清热解毒、降三高等功效，被作为新安村特色产业推广种植。目前，三星镇已有8个村、近800户村民种植苦草，种植规模达1530亩，玉海棠公司负责定向包收。同时，玉海棠公司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合作研制出以苦草为主要原材料的清茶、咖啡粉、精油等系列产品。“一湖”指海棠湖，由废弃的鱼塘开发而成。玉海棠公司与上海海洋大学开展技术合作，成立了玉海棠河蟹研究所和软壳蟹生产基地。新安村的特色农业逐渐由传统种植业向三产业链式发展转变，“一花一草一湖”逐步向“一条链”跨越。二是立足联农带农，提高村民收入。新安村以玉海棠公司为载体，通过多种途径壮大村集体经济，提高村民收入水平。首先，新安村与民营资本合资盘活了村级资产；其次，村民与玉海棠公司既可以签订订单合同为其种植苦草，还可以将土地流转至公司获得租金收益；再次，玉海棠公司启动村内闲置农房改造民宿项目，给予村民11元/平方米的月租金、10%的利润分成。

(三) 工业带动，促进农业增值增效的“2+1”龙头企业引领模式

该模式一般以农业加工企业为龙头，以“企业+农户”“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等组织形式，发挥龙头企业的资金、技术和信息优势，通过统一生产标准、生产资料、生产工艺、产品品牌等方式带动农民和合作社发展规模生产。

以松江区松林“种养双链融合发展”模式为例，主要做法有：一是种养结合、生态养殖。公司将养猪场分点布局在稻田中间，猪粪尿可以作为有机肥通过管道直接排放至稻田，实现了废物资源化利用。二是集约化、智能化养殖。在松江区叶榭镇和金山区农业园区，公司开发新建了两栋联排“4层楼房式”规模化、集约化生态养猪场。相较于传统养猪场，楼房智能化养猪场节约土地80%以上，而且同步建成的全程智能化排污设施，不仅提高了废气、粪便的处理效率，还具有集大数据分析、智能化控制和数字化管理为一体的优势，大大节约了人力成本。三是以标准化管理控制产品质量。公司对生猪养殖产业和水稻种植产业均实行标准化管理，通过对家庭农场提供种苗、定向回收、集中加工、共用品牌，并通过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体系认证、无抗生素养殖认证以及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等多种方式保障产品质量。

(四) 服务业主导，反哺农业升级的“3+1+2”数商兴农模式

该模式以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为驱动，聚焦商产融合，加速电子商务与农业生产活动深度融合，实现农产品交易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以新零售电商平台盒马鲜生为例，盒马鲜生通过“生鲜电商+基地直采”高附加值供应链模式，成为推动“数商兴农”落地的实践样板。主要做法：一是助推生鲜农产品生产企业数字化转型，拓宽销售渠道。上海有机农产品生产商万禾借助盒马平台人工智能算法技术不断提升用户黏性，提高采购订单精准性，将产品仓储成本降低了1/3左右。同时，万禾根据盒马供应链的年度需求规模，将种植品类从30多个调整到10多个，优化了产品种植结构。二是向上游延伸控源头，探索数字化、工厂化养殖。2019年，盒马工厂化养虾基地落地崇明，利用专业团队自主研发的三段式工厂化养殖系统，

养殖南美白对虾(盒田虾)，成为零售行业中首个运用生物技术自主养殖活鲜的探路者。2022年，“盒田虾”正式开售，单店日销量可达300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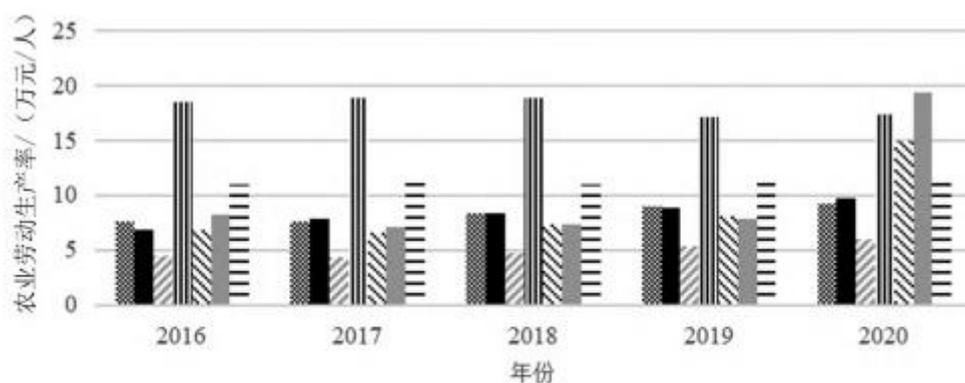


图1 “十三五”时期国内主要城市农业劳动生产率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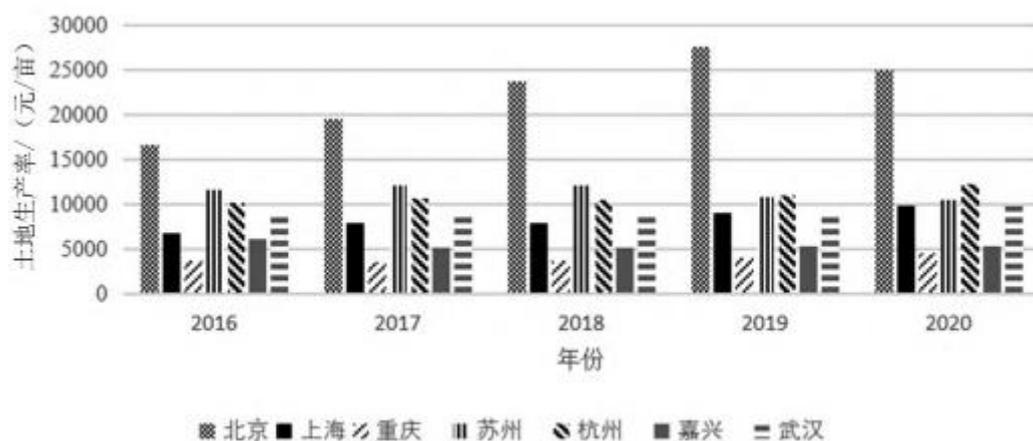


图2 “十三五”时期国内主要城市土地生产率比较

二、上海都市型乡村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 农业产业效益总体偏低

目前，上海农业依然是弱势产业，与发达国家以及国内其他城市相比，上海农业劳动生产率(人均农业总产值)和土地生产率(单位面积耕地农业总产值)都存在较大差距:2016年上海农业劳动生产率68930元/人，仅为2015年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15.34%。^⑤从图1可见，“十三五”时期，上海农业劳动生产率远远落后于苏州，且增长趋势并不明显;2020年上海土地生产率9855.87元/亩，而北京的土地生产率是25021.26元/亩，约为上海的2.54倍(图2)。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和经济中心，上海的农业产出效益与国内先进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在乡村产业方面发挥的辐射和引领能力远远不够，乡村产业效益有待进一步提升。

^⑤王丽莉、乔雪在《劳动力市场扭曲与中美农业生产率差距——基于Roy自选择模型的分析》一文中指出，美国2015年农业劳动生产率为72166.73美元/人。

(二) 乡村产业资源要素供应趋紧

当前,上海乡村地区土地、人才、资金等要素供给不足现象较为突出。主要表现为:一是土地要素制约。截至2019年底,上海耕地面积为242.97万亩,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耕地面积约0.098亩,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世界平均水平的2.5%。扣除三区(粮食生产功能区、蔬菜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划定面积136.49万亩,可用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耕地十分有限。二是人才要素制约。上海各涉农区农业从业人员结构性失衡严重制约了乡村产业发展。一方面表现为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上海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平均年龄为57.7岁,经济作物生产经营者年龄普遍超过60岁。另一方面表现为兼业化经营现象突出,农业经营成为上海郊区农民的副业,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应用新技术的积极性明显不足。三是资金要素制约。当前上海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资金主要依靠农村集体经济和财政支持。虽然近年来上海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镇村组三级集体经济总资产达到6351.3亿元,但是以物业经济为主的农村集体经济模式发展空间受限,难以支撑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壮大。

(三) 乡村产业品牌影响力不足

上海具有全国影响力和世界知名的品牌较少,乡村对城市高收入群体缺乏强劲的吸引力,限制了乡村产业效益进一步提升。上海虽然培育了8424西瓜、马陆葡萄、亭林雪瓜等优质农产品品牌,但囿于农产品生产规模较小,产量仅够供上海市场自销,在全国范围内缺乏品牌影响力。关于休闲农业品牌,近年来上海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景点数快速增长,但是休闲农业的年营业收入以及年接待量均未出现明显增长,呈现波动变化趋势。例如,2014年休闲农业营业收入为13.75亿元,年接待人次达1801.4万人次,但2018年休闲农业营业收入为12.67亿元,年接待游客1631万人次。这反映出上海休闲农业存在供需失衡现象,以“农家乐”“农事体验”等初级业态为主,产业链条短、活动产品单一的粗放发展方式导致休闲农业品牌效应不足,吸引力不够,缺乏适应消费者中高端需求的康养基地、高端民宿以及亲子农场等高端业态。

(四) 乡村产业融合度不够

一是经营主体融合不够。农业经营主体仍以散户为主,组织化、规模化程度偏低。由于分散经营,产品单一、总量不足,各个经营主体合作关系松散,难以发挥规模经济和品牌效应,导致农业产业效益较低。虽然农户与农业产业化组织形成了利益联结机制,但是农户从联合体中获得的收入占比极小。根据上海市调查年鉴,农业产业化组织与农户的联结方式以利润返还和股份分红为主,接近90%。但是从农户从产业化经营中获得的收入看,利润返还和股份分红两项收入非常少,两项收入之和不足5亿元。这说明当前农户在农业产业化组织中依然处于劣势地位,利益分配方式有待进一步完善。二是产业链增值空间挖掘不够。2020年,上海农副食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1.2:1,远低于发达国家3.5:1的水平。上海的农产品主要用于自产自销,特别是蔬菜、瓜果等鲜活农产品,以鲜食为主,无法进入产业链下游加工环节,导致农业的经济效益较低。另外,上海的农食链偏短,就业和经济的带动能力有限。2019年上海第一产业从业人员32.20万人,创造了284.84亿元的农业生产总值;而同期荷兰17.3万农业从业人员,创造了893.76亿元的农业生产总值,人均农业总产值是上海的近6倍。

三、实现上海都市型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选择

(一) 围绕产业振兴目标,突出融合发展导向

1. 吸引城市居民参与农业实践,促进城乡主体融合

城市居民是绿色农产品、休闲农业的主要消费者，拓展农业多功能性不能将城市居民排除在乡村产业融合主体之外，而要提高城市居民参与度，鼓励城市居民参与农业实践，增强城乡要素互动性。许多国外都市农业提倡消费者参与其中，与生产者共建信任、分担风险，以提供土地租种和产品配送服务的方式，在农场和城市居民之间建立紧密联系。例如，日本的市民农园，农园主把整个园地划分成若干块，分别租给不同的市民，供其耕作体验。社区支持农业的 CSA 模式(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农园经营者对外招募消费者份额成员，普通份额成员预付费用 2500 元，可享受每周一次的新鲜时令蔬菜，总重量不少于 200 公斤；劳动份额成员预付年租金 1000 元，可租种 30 平方米土地，收获全部农产品。当前，上海 60%的常住人口已进入中等收入群体，^⑥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对生态农产品的需求是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2. 灵活多样配置资源，实现资源要素融合

(1)土地要素。创新土地供给制度，缓解乡村产业用地约束需要开源节流双管齐下。一是开源：乡村休闲项目容积率低、层数低、需要永久性建设用地的比重少，若采用传统整片式供地导致土地资源浪费、建设成本高昂。因此可借鉴推广“点状供地”方式，使旅游开发项目与农田、水域等原生态场景深度融合。同时落实好现有的村集体建设用地指标优先用于乡村发展的相关政策。二是节流：放“中间”抓“两头”，大力发展农业总部经济。上海发展农业总部经济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和科技、市场、人才等优势。农业总部经济一般表现为“总部+生产基地”的形式，如上海的艾妮维专业合作社在上海建成 150 亩繁育种植基地致力于南瓜多品种繁育，并将种子提供给海南、山东、新疆等全国各地的南瓜种植基地，南瓜经种植基地生产、初加工后运至上海完成深加工、包装和销售等环节。这种“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的模式既能缓解上海农业用地资源稀缺的问题，又能最大化土地产出效益。

(2)资金要素。一是农业补贴要突出重点。从现在按种植面积为主的普惠式补贴模式，转变为重点补贴农业科技研发、技术培训、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如荷兰农业补贴资金很少采用项目制的方式，而是先建后补、以奖代补，能更好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性作用。二是用财政补贴撬动社会资本。通过税费减免等政策引导社会资本投资特色农业产业，推动资本要素流向农业，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例如，北京平谷绿色方圆 300 万只蛋鸡现代化产业项目采用的 PPP 模式，该模式是平谷村民组建合作社提供土地，政府和正大集团投入资金，集团负责运营，每年向农民支付固定比例资金用于还贷和分红。

(3)人才培育。一是借助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力量，通过“干中学”培育高素质农民。农民专业合作社一头连着农业技术人员、一头连着农民，可以通过田间课堂结合田间实践的模式向农民传授先进技术和种植理念。例如，上海春润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创办了农民田间学校，向农民传授稻鱼综合种养生态农业技术、化肥农药减量施用理念等。二是吸引青年人才成为职业农民。当前上海农业从业人员面临严重的结构失衡问题，亟须培育一批具有先进经营理念和学习应用能力过硬的青年人才。可借鉴小毛驴市民农园(CSA 模式)的新农人培育模式，每年面向全国大学毕业生支农骨干和社会有志青年招募约 10 位学员，开展“半耕半读”式的田野训练，完成从生产、技术、运营、销售、管理等农业全产业链的体验学习。结合农民田间学校的模式，上海可鼓励一些发展较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挥人才、技术优势招募青年学员，培育新农人。三是要大力培育农民主播。加大对农民的电商培训力度，促使农产品销售渠道由“地头买卖”向“网上交易”拓展。例如，截至 2022 年 8 月底，崇明几家较大规模合作社的芦稷销量已超过 50 万根，其中 80%以上的销量来自直播带货。

(二) 围绕科技创新支撑，突出全链智能驱动导向

^⑥① 《新发展格局下如何促进上海的居民消费》，网址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566850

1. 基础环节:依托生物技术,提高农业用地产出效益

一是借助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优势,打造种源农业新高地。长三角地区具有雄厚的科教资源储备,上海可牵头成立长三角种源农业联合体,集中长三角地区农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科研力量,主要围绕上海特色农产品、生态绿色农产品以及养生保健功能型农产品构建现代种业培育体系,打造种源农业新高地。二是依托种养循环技术,合理调整优化农业结构。要提高农业用地产出效益,适度发展养殖业是一条重要途径。发达国家的养殖业比重一般都超过种植业,他们通过科学测算农地对养殖业的承载力确定养殖业的发展规模,既发展有机农业,又保护生态环境,这种思路值得借鉴。三是寻求土地资源监管、治理和修复技术突破。上海都市农业科技的突破要从土地资源的监测、治理入手。聚焦全面调查、科学感知、精细治理的科学技术体系,在耕地质量大数据、土壤生物多样性保护、耕地养护技术等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新进展。

2. 生产环节:推广智慧农业技术,克服农业“靠天吃饭”的弱质性上海都市农业发展要“扬长避短”,充分利用大都市的资金、物资和科技优势增加农业投入,提高农业用地产出效益。一是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蔬果、花卉等,采用技术手段拉长上市供应期,尽可能使农产品实现全年生产、四季供应,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和产值。二是培育一批数字技术应用示范基地,推进5G智慧大棚、无人机植保、农业机器人、智能环控设备等农业新技术应用先行先试,利用消费者偏好数据分析指导精准种植,带动数字农业由点到面不断推进。

3. 管理环节:以“农业一张图”为基础,完善数字农业平台体系建设

农业数字化转型不是简单的实现某个环节的数字化应用,而是实现从基础设施、数据采集、数据融合挖掘到数字控制全流程的数字化改造升级。一是要实现“新基建”城乡全覆盖,加大农村网络资费优惠力度,全面推进5G网络深度覆盖,加快实现光纤网全覆盖,为解决农民的数字化贫困奠定基础。二是构建智能数字采集系统,统一标准。建立完善的农业数据结构和数据规范,明确采集方式和采集频率,制定一套通用的数据格式标准,加快系统整合和数据汇聚,为整合各类农业要素主题资源库奠定基础。三是统一规划设计数字农业云平台。依托上海“农业一张图”的基础数据资源,构建数字农业云平台,使行业数据、政务数据和社会数据实现互联互通。挖掘数字农业云平台的大数据资源应用价值,开发建设各类服务于生产者、消费者和管理者的专业性功能服务平台,实现由“行业管理”向“行业服务”的转变。

4. 销售环节:借助互联网技术,推广“基地直供”营销新模式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农产品销售渠道正经历深层次的电商化变革,上海要抓住机遇,积极推广“基地直供”营销新模式。一是基地直供消费者模式。主要形式是“移动单下单—前置仓配货—即时配送到家”,在这种模式中,政府应积极承担起鼓励引导、对接联络作用,推进优质地产农产品与电商的对接;增加专项资金补贴电商平台对接成本;鼓励电商平台联合农民专业合作社,共建生产基地等。二是基地直供社区模式。社区是指以地理或组织为单位的一个个群体,该模式以社区为单位配送农产品。在这种模式中,政府需要做的便是搭建基地和用户对接的网络平台,主要围绕农产品生产、采摘、采后处理、分拣、分级、包装、运输等全过程制定农产品电商标准等。三是基地直供商超。鼓励各大商超采取“基地直采”模式,缩短生鲜农产品中间环节,降低交易成本。由超市制定农产品生产标准,预估市场需求量,农民专业合作社按照标准和需求量生产农产品,再由超市的冷链和物流配送系统运至各门店销售。

(三) 围绕农科教结合优化升级,突出精准思维导向 1. 分类经营、找准定位

目前,上海的休闲农业普遍存在低质化、同质化等问题,乡村旅游提供的服务多是采摘、赏花、农家乐、农事体验等低端游玩项目。消费者也多是走马观花式游览、很难产生二次消费的欲望。针对这种现象,休闲农业要转变经营思路,瞄准细分市场消费主体,提供精细化、专业化服务。例如,按照服务范围由小到大、服务质量由低到高,农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入门级农场体验——采摘类。这种农事体验活动门槛较低,只需要果园、菜地等就可以开展采摘业务,同时配备一些娱乐设施供使用;二是进阶级——亲子农场。这种农场功能分区清楚,可包括种植区、采摘区、喂养区、娱乐区、餐厅和教室。农场配备专业教师室外开展挖红薯、收稻谷等活动,室内开展蒸面点、榨水果汁等活动。针对更高消费需求的客户,还可安排教师全程用英文组织儿童体验农事,举办篝火晚会、焰火表演之类娱乐活动,如上海九善、百欧欢等高端亲子农场。

2. 打造农场 IP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也是一种产品,同样需要品牌加持,而 IP 打造是塑造休闲农业品牌、提升休闲农业品质、吸引游客的有效手段。例如,新西兰的 Hobbiton 农场,借助《霍比特人》《指环王》电影 IP 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游客可以在农场看到电影情节中霍比特人洞、派对树等景点,还可观看各种小动物,体验牛棚挤牛奶等农场生活。

上海休闲农业可借鉴这种深挖 IP 价值的模式打造深度体验式乡村旅游。

参考文献:

[1] 陈龙庭,顾海英.绿色生态循环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探究与启示——对上海松林食品公司的剖析[J].上海农村经济,2022(3):34—38.

[2] 胡晓鹏,李庆科.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生关系研究——对苏、浙、沪投入产出表的动态比较[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26(2):33—46.

[3] 李治,王一杰,胡志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评价体系的构建与评价——以北京市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11):111—120.

[4] 王常伟,吴方卫.我国大城市郊区智慧农业发展探索[J].科学发展,2022(2):85—91.

[5] 张林,温涛.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J].中国农村经济,2022(7):59—80.